

鸡
鸣
丛
书

重回「五四」起跑线

丁
帆
著



学
出
版
社

鸡
鸣
丛
书

重回「五四」起跑线

丁
帆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回“五四”起跑线/丁帆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2

(鸡鸣丛书)

ISBN 7-02-004363-1

I. 重… II. 丁… III.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世界-文集 IV. 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6626 号

责任编辑:李建军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常 虹 责任印制:李 博

重回“五四”起跑线

Chong Hui 'Wu Si' Qi Pao Xian

丁 帆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0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7.125 插页 2

2004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7-02-004363-1/B·294

定价:13.00 元

总 序

董 健

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于1999年底经专家评审,被教育部批准公布为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这使它蒙上了一层浓厚的“体制化”的色彩。因此而得到的指导与资助,固然是好事,但也使学术研究这种极需“个人化”与“自由度”的工作,在运作上平添了不少机械的“行政气”。种种非学术性的检查、汇报,“量化”管理、等因奉此,掣肘多多。

然而,三年以来,该中心全体研究人员,不论是来自本校的还是外校的,也不论是专职的还是兼职的,大家兢兢业业,克服重重困难,做了不少艰苦的研究工作。应该说,取得的成绩是颇为显著的。单就中心的重大科研项目来说,已经完成的有两项,这就是丁帆、许志英主编的《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114万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和董健主编的《中国现代戏剧总目提要》(400万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正在进行中的有三项,即温儒敏主持的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研究、陈思和主持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研究与胡星亮主持的中国当代戏剧史研究。还有一些中小型课题也在各位研究人员的手上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其中不少的已经以论文形式发表。另外,中心召开的三

次学术研讨会(其中一次为国际会议)的论文集《多元语境下的精神图景》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也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

为了检阅本中心研究工作的实绩,进一步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我们从今年开始着手编辑出版“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文库”鸡鸣丛书。今年先出第一辑计 10 种,都是中心专职或兼职人员的研究成果。

丛书取名“鸡鸣”,固然会叫人想到它的地方特色(南京有鸡鸣山、鸡鸣寺),也隐含着表彰勤奋、良知之意(所谓“鸡鸣而起,孳孳为善”)与呼唤自由、光明之意(所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但在我们研究中心来说,首先还是出自一种希望建立一个学术高地的“野心”。现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已经挂牌不少,然而“基地”如果仅仅去“填报表”、“出数字”而枉费精力,却不能成为真正的学术高地,那就徒有其名。“鸡鸣”之称自然会唤起一种学术高地的意念。为什么这么说呢?鸡鸣山是巍巍钟山伸进南京城内的一脉,早在明朝初年(14 世纪),此山就是“国子监”之所在地,用今天的话说,这里有一个“大学城”。清朝末年张之洞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1902 年始),就坐落在这个昔日大学城的遗址上,此亦属我国现代大学源头之一,当时号称“最为新政大端”。三江之后是两江师范学堂(1905 年始)、东南高师(1915 年始),再接下来就是东南大学(1921 年始)、国立中央大学(1927 年始)、南京大学(1949 年始),悠悠百年,绵延不断,这座鸡鸣山就是学术高地的象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华民国”时期的中央研究院这样的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也与中央大学为邻,紧靠在鸡鸣山的怀抱里。即使是在 40 年代国民党最腐败不堪的年头,大学和研究院这样的学术和精神的高地

都能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在整个社会上仍然是一股强大的清流，抗拒着滚滚而来的社会浊浪。1948年鸡鸣山下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它作为一个体制化行为而高度体现了政治上的宽容与学术上的自由，这是近年来知识分子颇为乐道的一段佳话。当时选出的院士，人文组28人个个都是学界巨子，即使在政治上为当局所不满的左翼学者如郭沫若、马寅初之辈，亦皆名列其中，而有些颇得官方赏识的学者却名落孙山。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学术的权威由是而立。显然，建立学术高地，不仅要严防社会腐败之风（目前此风正猛烈地向我们袭来）对学术界的侵袭，而且要时时维护学术的独立、自由和尊严，对此，我们有颇多的感慨与期待，同时也是怀有信心的。

其次，看中“鸡鸣”这个名字，还因为鸡鸣山上有座鸡鸣寺，鸡鸣寺里有座豁蒙楼。古寺的晨钟暮鼓，往高处讲，自然可以引出一些有关人的精神生活与精神状态的话题，这里且不去说它。单是这豁蒙楼，就对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颇有些警诫的意义。豁蒙之义与启蒙相通。中国人吃尽了受蒙蔽之苦，但自从上一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有人说五四启蒙早已过时。然而看看近十多年的文学界吧，譬如，不久前我还看到一位法学家竟然出面捍卫“样板戏”里的所谓“公序良俗”和“民族精神”。这种种怪现状不都在说明着未经启蒙的精神蒙昧吗？我们的文学研究难道对此能漠然视之吗？

豁蒙楼是张之洞在创建三江师范学堂两年之后，也就是戊戌变法失败六年之后，为纪念他的得意门生杨锐而修建的。杨锐为政治改革触怒专制主义而掉了脑袋。张之洞重游鸡鸣寺，忆起甲午中日战起之年与杨锐同登此寺置酒畅谈、纵论古今，为国势阽危而痛叹的情景，似乎对当年学生吟咏杜甫“朗咏六公

篇,“忧来豁蒙蔽”的诗句又生出了一层系于现实的解读,遂倡议起楼,并亲笔题“豁蒙楼”匾额。看来,一切有点求新、求变头脑的人都有一种反蒙蔽的焦灼感。豁蒙者,解蔽也。看清了遮盖、蒙蔽之物而将其揭去,叫人心明眼亮起来。这既是一种自然现象,也是一种精神现象。譬如在鸡鸣寺建此楼之时,为了登楼远望,一览湖光山色,张之洞要求尽伐近边的丛木,这就是给自然景观除去了遮蔽。精神上的豁蒙当然是更加困难的。中国人讲“正心”、“明道”、“解惑”、“劝学”、“致良知”等等,多少也有些精神豁蒙的意思在,但在那个专制主义的文化大框架之内,所谓豁蒙往往转来转去又变成了新的蒙蔽。专制必愚民,愚民必施蒙蔽之术,此为铁律,谁也破除不了的,即使在当代亦难免。就说20世纪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吧,我们至今还记得,人一犯错误就检讨说受了蒙蔽,然后被“代表正确”的人教导一番,“心明眼亮”地去“战斗”,但不久就又有新一轮的“正确者”来宣布你再一次受了蒙蔽。清华大学曾流行一个顺口溜:“受不完的蒙蔽站不完的队,做不完的检讨流不完的泪”。何以至此?等到“文革”噩梦一醒,才知道当时全民都处在一个精神蒙昧的时代。

真正的思想精神上的豁蒙,现在叫启蒙(enlightenment),这是从18世纪西方启蒙主义运动才开始的事。在中国,五四启蒙打开了人的思想、精神的新境界,是人与文学的现代化不可缺少的一课。但是,老的“左派”说,启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早已被马列主义指导的革命所取代,现在再讲启蒙,就要“启”出反党的思想。所以,王元化主编的《新启蒙》曾被粗暴查禁,并受到批判。“新左派”则说,启蒙是西方来的“殖民话语”(按:此言本身倒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殖民话语),要捍卫我民族独立性,应拒之于国门之外。马克思主义只能吸纳、包容而不可能颠覆、取代启

蒙主义。有些新派论者以“审美现代性”否定“资产阶级现代性”中的启蒙精神,也是很片面的。只要你承认人类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具有共同与共通之处,你就不能不会看到现代启蒙的核心精神之所在,这就是:使人告别奴隶状态,做一个独立自主之人;告别蒙昧状态,做一个心明眼亮之人;告别迷信盲从状态,做一个明理自觉、个性健全之人;告别视官、上司为父母、为老爷的传统的臣民状态,做一个敢于捍卫个人自由、平等权利的现代公民。凡此种种,中外先贤多有系统阐述,虽是老生常谈,至少在中国却并未过时。凡此种种,关乎民主、自由之制度建设,均为人类共同与共通的追求,早已超越了阶级与国度,没有什么你强加于我、我强加于你的问题。这里用得上孙中山的那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文学拒绝启蒙,便不出政治工具与庸人玩物两途,这当然是我辈同仁所高度警惕的。至今还有不少人将“启蒙”与“政治”混为一谈,将“去政治化”与“反启蒙”作为一件事。岂不知有些政治行为本身,如果它不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那么它就必然是以蒙蔽人民为前提的。

再次,“鸡鸣”之称中的一个“鸣”字,至今仍不失其对文人学子的一种莫可名状的诱惑力。吾辈既为文人学子,便不可不思;思而有得,便不可不鸣;鸣而遇到不同之见或受权威压制,便不可不进而争、进而再鸣。如此往复无已,学术便得到发展。1957年“大鸣大放”虽然吃了苦,但人们至今难以忘怀那个短暂的学术春天所显示出的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正气。最近十多年来,学术环境相对来说比以前是宽松得多了,“多元化”的口号也叫得颇为响亮,但总也形不成“百家争鸣”的局面。鸡零狗碎、庸俗不堪、充满广告味的“热点”(如文学界为所谓“名誉权”打官司之

类)倒是不断出现,也时有某某领域某某人有某某“新说”、某某“新论”的报道,但多为炒作,认真严肃的学术争鸣却是没有的。归根结底,这是学术界独立自由的创造精神的萎缩所致。简单化的、直线的“两元对立”(alternative)的思维模式已经使我们的学术受害匪浅。要神化鲁迅,就必把胡适妖魔化,或者反之。为了冲破“鲁郭茅”的评价格局,便非把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抬得更高不行。这种非此即彼的视角,叫人辨不清历史的真实色彩。很少有人从综合的文化效应上,从人与文学之现代化总趋势上,去研究鲁迅与胡适的共同价值及其在今天的意义。如鲁迅主张改造贯为人奴而麻木不仁的“国民性”,张大“个性之尊”,呼唤“人国”之建立;胡适则鼓吹健康的“个人主义”,这在人的现代性追求上是一致的。又如关于中国现代文明的再造,鲁迅主张“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胡适则鼓吹“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二者相通之处也是十分明显的。一定要非此即彼、你死我活,首先被丢弃的往往是最有价值的东西。再比如,现在讲“民族性”、“民族精神”很时髦,但很少有人从鲁迅、胡适已达到的思想高度上来揭示“民族性”、“民族精神”之反现代性的巨大负面影响。只顾顺着“国情”、“中国特色”去讲,所谓“中国化”就往往不是化向新、化向现代,而是化向旧、化向前现代、反现代,就像鲁迅所说的:“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

深度争鸣的缺失,还因为我们往往在貌似“多元化”的众声喧哗中,找不准价值的定位。主张“多元化”,提倡学术上互相宽容与尊重,决不意味着无比较、无权衡、无轩轻、无选择。面对互相对立的思潮与倾向,不偏不倚而“执中”就行了吗?孟夫子说

得很明白：“执中无权，犹执一也。”这里讲的这个“权”字非常重要。权就是秤锤，没有它，你无以知轻重。所以孟子认为，没有权衡的“执中”仍然是片面的、偏于一端的“执一”。现在有些貌似很“公允”、很“折中”的理论，其实是很偏狭的。偏狭之风与浮躁心情有关。孟子在讲到无“权”之害时，举了个生动的比喻：饥不择食、渴不择饮的人，别看他吃喝得津津有味，但其实他是得不到“饮食之正”的，因为口腹的“饥渴之害”使他不暇掂量、选择，不能沉着、从容地做事。我们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后现代”的鼓吹者，有时就会露出这种“吃相”来。这样吃，就难免从垃圾里吃出“美味”——比如，从“文革”里品出“民主意识”，从“样板戏”里品出“后现代性”等等。所有这些现象都说明，一个既有价值定位又不断于一尊的深度争鸣的人文环境，对我们的学术研究是多么重要。

不论是文学创作，还是评论与研究，说到底就是苦心孤诣地把那么一点“思”、一些“感”用语言表达出来。现在时髦的说法叫做“言说”(discourse)。说什么？怎么说？这是言说水平的问题；向谁说？听谁说？这是言说对象的问题。心之所感有正邪，思之所得有深浅，言之所形有是非，这里边是大有讲究的。大抵古人早就感到了言说之难吧——晋朝有个叫刘处宗的人，家养一只会说人话的长鸣鸡。这位刘先生就是与鸡的对谈当中“言功大进”，即大大提高了言说的水平。故而古人著书立说多称“鸡谈”、“鸡谭”云云。这个故事见于南朝宋刘义庆辑录的《幽明录》，那时的人看重言谈之功，才会编出这么一说。鸡当然是不可能说人话的。这一方面说明古人亟欲提高言说水平的迫切性，一方面也说明言说对象之难以到位的困惑与无奈。与其对牛弹琴，不如沉默与独语。与通人语的鸡对谈不是比与不通

情理的人对谈更有益吗？我们的《鸡鸣丛书》当然面临着当代世界的言说之难。单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领域，从上世纪 30 年代以来，就在“说什么？怎么说？向谁说？听谁说？”的问题上形成了一系列的概念和规矩。这些概念和规矩，一直都在牢牢地统治着我们的头脑。如今，必须对它们一一加以梳理和甄别，有些应该被质疑、被替代、被颠覆。否则，我们的研究就不可能取得进展。这当然是困难的，但我们会在困难之中言说出新的水平来，这样，也就会逐渐建起学术的高地。

2003 年 5 月 30 日初稿

7 月 20 日改定

于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

自序

重回“五四”的起跑线,已经成为我近年来为文的潜在宗旨。

1979年,我踏上了文学研究与批评的学术道路,在文学这方精神领地上耕耘了二十多个春秋。其间,随着自身方法论的更新、批评观的递嬗,一条治学轨迹也突显出来:从作家作品论到文学现象的整体认知,从探悉文学的内部构成拓展到认识文学生成的外部环境,从文学的微观世界的阐发到宏观世界的把握,从文学境遇的体察到文化命脉的忧思乃至更为深远的人类生存境况的人文追问,……都紧扣着五四人文精神的母题。

在学术研究的前期,我从作家作品的文本内部入手、深入到对象中去把握和理解对象的内在逻辑,尊重研究对象“独立存在”的具体历史理由,进而建立对它们的历史的、美学的价值判断。因为这些作家某种程度上导引并推动了当代中国文学话语实践的历程,我对他们的关注和考察也就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新时期”以来艺术衍进的变奏情况。我努力跟踪把握同时期文学现象、为变动中的当代文学进行价值定位,尝试理清文学观念的演化状况。后来,通过寻找更广泛的研究视角,我试图更新当代文学史图景的描述方法。在这些研究中,我开始注意与文学相关的广泛的文化现象,尽力描述某一现象思潮的具体的“历史情景”,重视文学现象、文学作品生成的文化环境,关注宏观文学

潮流与审察具体文本相结合。由于结合了对历史的认识和对时代生活的认识,使得文学现象在个人的切身体会中获得尽可能合理的理解,获得了文化范畴中创造性阐释的可能性。从侧重于微观批评的作家作品论起步,到追求一种建立在微观细察之上的对中国当代文学乃至文学本体的更高远更全面的整体观照,我逐步做到了微观批评与宏观批评的合一,并在此基础上才力求立足高远、深入浅出地解析社会人生、文学文化。我追求美学历史批评与本体批评的统一:试图在艺术细节上深入把握作品、对作品进入精辟的分析,也将批评对象置于其特定时代文化背景下,以“知人论世”的原则进行考察,使作家作品不但体现出其美学上的意义,亦显示出其历史的、社会的价值。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现代知识分子,在学术研究中,一直不曾泯灭的是我强烈的现实参与精神与社会责任感。文学绝对不是自足的,它的意义应与现实社会、道德理想乃至人类终极关怀密切相关。所以,我的文学批评有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直至渗入文化批评领域。

近期,我研究的着眼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当下文化语境及其生成

我认为中国在文化体制没有突变的情况下,能够如此迅速地与世界文化对接,如此深刻地融会于西方文化,与当前社会机制受“全球一体化”的影响有密切关系。经济的市场化带来了更深刻的文化意识形态的入侵,中国人的生活观念、思想观念、审美观念都在急剧的蜕变之中。就空间而言,随着中国西部开发,中国漫长的农业文明必然走向终结。在这样的轨道上,“全球化”逐渐消解着中国近、现代以来沉重的启蒙话语。

我对当下中国文化的整体特征作出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互渗”的判断,这构成我审视诸多文化问题的支点。我认为,马克思的历史断代学说不但适用于中国文化发展阶段的历史描述,也适用于中国文化形态的描述。文化界社会性质的大讨论包含了对中国“现代性”的巨大质疑,也是对中国一再错过“现代性”契机的诘问。由于一次次历史反动,20世纪后半叶,中国依然沉浸在无边的农业文明的社会形态和文化语境之中,尽管沿海地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文化矛盾已经突显出来。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叠加,强大的封建思想毒素不时与某种看似现代的思潮媾和,一次次使向资本主义转型的社会文化命题胎死腹中。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文化现代性的残缺昭显出中国历史断代的封建性悖谬,需要作出深刻的文化反思。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互渗使得启蒙者的立场复杂化了,后现代性的植入是一个重要原因。在现代化的“补课”中,随着工业文明的铺展,中国社会结构的某些部分已经提前与西方社会一同进入了人类新的文化困境命题的讨论之中,在同一时间纬度上,在中国的沿海城市,贝尔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以詹明信、吉登斯们所描写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矛盾”,已经混杂在一起。一个更有诱惑力和挑战性的、具有世界意义与人类意义的“后现代”文化命题出现了。80年代中期关于“后现代派”的讨论是在一元启蒙的文化语境中讨论问题,其所得出的“中国尚未形成适宜现代派成长的土壤和温床”的结论早已过时。中国部分地区已经和西方经济、文化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因而也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先行的社会机制中形成了二元文化困境命题的表征。人类处在高科技文化语境之中的困惑,即资本主义和后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已经先期抵达中国文化的彼岸,与20世纪的“现代性”问题一起,闯入我们的文化视野。可

怕的是,当这个文化语境在我们周围生成的时候,很多人都浑然不察,抑或手足无措,失去了判断的能力。

二、知识分子问题

在上述二元文化困境中,我进而思考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问题。各个国家的社会发展是不平衡的,从空间上来看,它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文化滞差”;而就时间上来看,一个国家内因为社会变革所引起的物质与精神的断裂,则形成了历史环链上的“文化滞差”。欧美国家在20世纪初所面临的人文困境,赫然呈现于21世纪初的中国。这给知识分子带来了五色的文化眩晕症。我以为,要想在理论上有所创新,首先必须解决的是价值理念的改变。“五四”以后知识分子心目中建立起来的以人为本的价值体系,一直是我们判断事物的标准,如今,这一标准在强大的物质主义冲击下摇摇欲坠。当代知识分子要克服“文化滞差”所带来的人文理论困惑,仅仅期望于人文主义与物质主义的协和共存是不够的。这就需要拓宽许多已经显得十分狭隘、软弱的理论预设。在中国近二十年的资本发展和积累过程中,人文本体的丧失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提升而愈加深刻。

此时,作为一个“阐释中国的焦虑”者,许多人都以为开发性的多元理论框架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最好方法,幻想从多元的理论框架中获得对表象世界的平衡与瓜分。但我以为,在人类文化发展的任何一个历史环链中都有一个恒定的、超越一切时空的价值标准,这就是以人性与人道主义为底线的人文价值标准。它是任何创新理论的一个支点,任何价值的位移都无法避开这一撬动人类文化历史的支点。在“雅驯文化”与“商品文化”之间,我们必须更多注入人性文化的内涵,绝不能忘记人类文化价

值的底线。“人性最底线”的提法实际上丰富了单纯现代性语境中启蒙方案的参照系。知识分子有严重的人性危机。上帝死了,然后呢?人死了!知识分子没有被集权所打倒,可能很快被资本所打倒。迪特里奇从第三世界角度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向资本投降是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普遍问题,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问题是双刃剑,一方面要和体制作战,一方面要和资本作战,和商品文化作战,所以形成了我们观念的大倾斜。丧失了人性的和人道主义的标准,知识分子就会臣服于话语霸权,臣服于商品文化。

在将后现代的文化现象纳入人性、人道主义的审视框架时,人性概念的人类学蕴涵不能忽视。在人类进步意义的层面上,人性是一个宽泛的概念,甚至弥漫在形式主义层面的审美因素中。在当下文学批评中存在两种误区:对艺术形式进行孤立的审美走向了极端,样板戏孤立抽出来也有其审美性的一面;夹杂着忆旧情绪,孤立地看样板戏,就会偏离历史主义的态度,挖掘出荒唐的“文革现代性”。

上一个世纪是中国知识分子盲目启蒙而一再失败的苍凉世纪。作为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人文精神没有在中国 20 世纪强大的封建人文语境中得到根植与发展,从 70 年代末的启蒙补课,到 90 年代的商品大潮的冲击,后现代文化带来的种种戕害和亵渎人性的弊端又凸显在人们面前,成为又一个新的文化悖论,一柄难以对付的精神双刃剑。目前,中国知识分子应承担的最大责任是“二次启蒙”:不仅承担启蒙民众的责任,还要不间断的自我启蒙,从而避免启蒙的再次溃败。自我启蒙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是只有完成了自我启蒙,他们才有资格担任民众启蒙的社会角色。缺少了民众启蒙和自我启蒙双重承担的任何一

种,要解决当前文化问题,都只能是徒劳和枉然的。

三、文学的历史归属与当前处境

20 世纪的帷幔落下之后,中国当代文学的入史问题成为文学研究界关注的焦点。饶有意味的是,所有的当代文学史写作者都无法摆脱一种临场写作状态。研究 20 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学需要研究者确立自己的价值立场。作为治史对象的五十年共和国文学本身充满了“价值判断”,中国知识分子亦时刻处于文化、政治的“差序格局”中,因而,“客观中性”的治史愿望极易化解、消泯知识分子的人文立场。在现代、后现代两个文化板块的碰撞中,知识分子必须重新走进“拳击场”,找回更加符合人性的价值尺度,并以此找寻、接续五十年文学的人性通道。惟有实现了主体介入以后的历史的和美学的最高标准,并站在文学的高度扫描整个文化境况,才能在文学背后暗含对整个人类的文化关怀,才能体现出现代知识分子和古代文人治学方法的根本区别。现代性的稳态结构已经被 90 年代文化状况的多重悖论打破,这给 20 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学研究者提供了一次全面检索自身价值立场的契机。只有在知识分子的精神裂变中重建人文价值立场,全面克服研究观念、研究方法中的各种制衡因素,才能把握这种契机,实现对这段文学进行一种“临场”治史的史性品格的飞跃。90 年代文学是不可忽视的转型期。文学经历了十年“现代性”的反复回归与“后现代性”的超前演练,以及政治风浪的磨洗和西方现代文化理论的倾泻,变得愈来愈趋向单一化。在表面多元化的掩盖下,文学的本质却愈来愈向后现代文化所设置的单一物质化的理论陷阱坠落。但是,我们可以清楚地定义:20 世纪文学的终结,也就是真正与中国“古典主义”意义上